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主编 唐小林 饶广祥

任何人。任何文化。
一旦跨出前语言的“符号态”空间，
就永远回不去了。
只有诗性语言才能提供革命性的机遇，
使我们借助艺术语言中的诗性，
而隐隐听到往昔的仙乐。

诗性语言的革命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著 张颖 王小姣/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主编 唐小林 饶广祥

任何人，任何文化。
一旦跨出前语言的“符号态”空间，
就永远回不去了。
只有诗性语言才能提供革命性的机遇。
使我们借助艺术语言中的诗性，
而隐隐听到往昔的仙乐。

诗性语言的革命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著 张颖 王小姣/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 颖
责任校对:吴近宇 文 雯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语言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著; 张颖, 王小姣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1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 / 唐小林, 饶广祥主编)
ISBN 978-7-5690-0207-2

I. ①诗… II. ①茱… ②张… ③王… III. ①文化批
评史—世界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7997 号

Julia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 1974 by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France,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6-315 号

书名 诗性语言的革命 SHIXINGYUYAN DE GEMING

著者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译者	张 颖 王小姣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0207-2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张	13.75
字数	254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 / (028)85401670 /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随着人类进入全面符号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必然是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振臂一呼心血来潮的产物，完全是时代大潮使然。

科技拜物教，创新神话，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超常融合发展，未来5至10年，人类社会将以难以预料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全面卷入智能时代：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行将终结。万能基因剪刀，可以无中生有任何事物，包括人类自身。3D打印机任意挥洒想象，塑造世间万物，定制人间万象。万灵的感应器，替代人类全部触觉，海阔天空，上天入地，没有任何障碍，无人驾驶比有人驾驶更加安全。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可穿戴设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参与决策、比特币和区块链共谋、智慧城市，再加上万物互联，人类世界正被彻底改变。人类不再是单方面使用符号的动物，而是符号使用的动物。人类被自己的所造物——符号世界所围困。2016年，围棋九段世界冠军李世石被机器人阿尔法围棋战败，只是一个颠覆性时代到来的预言。

符号学在世界东方的时兴不是时髦，而是被符号化的时代所唤醒，为窘迫的现实所催逼；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不是应景，而是它的实践品格和未来朝向，使它没有理由放弃对我们当今和即将面临的时代的解释权。面对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后果，经典马克思主义响亮地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余音未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啸而过。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集结号下，竟然是智能人与自然人的合作或对立，人在与智能合体之后，如何实现自身的救赎，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耸人听闻，人类转型的巨大力量和超级速度，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正视。习以为常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盲目自信，使我们对身边瞬息万变的一切懵懂无知、措手不及。人类高傲的头颅，正在使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面对被符号泛滥甜蜜地淹没的事实，人类越来越丧失面对现实和眺望

未来的能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首篇，把商品作为符号，符号就已经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事实上，任何商品生产都是物性劳动和智性劳动的结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已内蕴符号价值。当且仅当智性劳动一端在商品生产中迅猛发展，直至一家独大的时候，信息社会、智能时代就已不可避免地到来。符号价值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商品增殖部分，它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内在要素，是构成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们所说的拟真、象征交换等，对于信息社会而言，从来就不在实在世界之外，恰恰是它们构成了实在世界本身，是对这个实在世界基本特征的指认。用“物质/文化”或“文化/经济”二元论，说不清楚商品和社会问题。要深入地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分析。

说到底，信息社会一切看似玄而又玄的现象，只有回到对经济基础和商品社会的透彻分析才能解决，才能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好像又走偏了路子。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国。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中国有了一个战斗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太多的矛盾与纷争，到如今我们仍然面临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构建一个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号召力和生命力，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思想基础和学术基础，它是建立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彻洞察、对人类未来走向的清晰判断之上的。它是基于马克思对人类全部知识、文明和思想成果的毕生探究，基于马克思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施蒂纳、蒲鲁东、赫斯、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思想者的反复论辩。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恰恰缺失这一重要的基础，往往流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空洞说辞。斯大林时代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基础，不仅与今天的社会现实没有关系，而且与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也有霄壤之别，更不必说对网络时代媒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形态进行缜密分析。丝毫不接地气，也不与时俱进，缺乏知识性、学术性支撑，拒绝与同时代思想交锋，对于亲见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或者毫无解释力的学说，单靠话语传声筒的力量，如何征服人心？意识形态空心化，显然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术知识空心化密切相关。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到第二代的阿尔都塞，到第三代的普兰查斯，再到第四代的拉克劳和墨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已被翻转。意识形态逻辑不再决定于基础逻辑，而是成为基础逻辑本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成变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构成”。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话语开始到话语结束，从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终，马克思主义变成单纯的话语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分析的放逐，对“经济主义的马克思”的背离，不仅使社会关系隐匿不见、模糊难辨，也使人类的未来暗淡无光。为批判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正在走向穷途末路，那就是正在演变为学术表演。

符号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处理符号的经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会处理符号问题，而不能局限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眼光。符号劳动是商品生产的内在构成要素，符号价值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要处理好符号问题，只有回到经济基础、商品分析。符号从来就不是什么异己力量，学会重视符号、善待符号、理解符号，才能充分开掘和发展符号生产力，才能从被符号奴役的困境中取得主动，实现突围，获得人类的再次解放。而一旦无视事实，把符号视为社会的冗余，文化的毒瘤，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时代发展的洪水猛兽，符号就会被异化，反过来又形塑和异化人类社会。为符号正名，为符号社会立法，重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现实维度，构建一个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丛书”的学术使命。

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这是我们构建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即便这一天就在眼前，一个自然人、机器人、智能人并存的世界，而人类依然能够诗意地栖居，能够与自己的所造物、与无所不在的符号和谐共处，共同奔赴美好的未来。老实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术期待，如此简单，如此辽远，而又如此未知。

致中国读者：诗歌，通往自由之路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作为 21 世纪的国际化网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尚未意识到符号学不仅是网络（互联网）的先驱，同时也承担着未曾预料却又不容辞的责任——消除陈词滥调，以及对抗高度关联化世界所带来的风险。

我所言的是哪一种符号学呢？

我很高兴《诗性语言的革命》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些中国读者也多被裹挟在邮箱、短信以及其他社交网络的浪潮之中，随波逐流。他们成为全球化的居民，穿梭于不同的国家，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同时，他们还是符号帝国的主体，日日夜夜地发送推特或者点“赞”。事实上，身负重压的、焦虑不安的、游离的、被全球化的男人和女人们迷失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在这一时空之中，符号渗透进他们的身体、感知和思想，点燃了他们生活的欲念并帮助他们对抗死亡。大多数人使用这些社交工具仅仅是为了消费或者交换“信息”。市场已经变为主导，而交流已替代灵魂。我并非想妖魔化这种高度关联的网络社会，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的高速化、内存的无限化、人们相遇方式的多样化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民主并促使其日渐成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关联的网络社会同时也激发了贪欲，加快了牟利的速度，并带来了与原教旨主义扩张相伴的野蛮行径。这种符号肆无忌惮的循环以损害符号的生命感（vie des signes）为代价而得以呈现。还有多少人能意识到，符号并非简单地指向人们所敲击的键盘上的字母，而是拥有着身体、记忆和欲望，且是反抗的、复调的、诗性的甚至充满爱意的呢？

我也同样在网络的乌托邦中自我麻醉。而在这乌托邦之中，我在思索，中国网民能否在语言沦为陈词滥调的危机时代重新为其注入活力？我的这一探寻或许源于我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了四年中文（当然，四年对于了解一门如此丰富的语言远远不够），抑或源于我对中国诗歌、哲学和女性主义问题

一直以来的迷恋。

中国的网民将这种符号的生命感铭记于心，他们有意无意地记住了老子和欧阳修的复调书写（écriture polyphonique），记住了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陆游和辛弃疾诗词中所呈现出的可感知的时间（temps sensible），以及古往今来许多其他的书写方式。就其本身而论，这些中国网民都是符号学家，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我对中国网民的这一想象与《诗性语言的革命》的主要内容以及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符号学是直接相关的。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来自保加利亚的学生，刚拿着戴高乐政府的一笔奖学金到达法国。当时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已经预见性地将欧洲的影响从大西洋延伸至乌拉尔山脉，而苏联封锁中的教条主义也开始瓦解。当时的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之上，意识形态之路在我看来似乎变得愈发狭窄；与之相反的文学则成为一种复兴欲望和理念的实验场。伴随着对俄罗斯未来主义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解读，我更加确信，若我们无法改变语言以及源于语言的其他交流符号——图像、音乐、姿态和行为，我们将无法改变社会。

那时，1968年的“五月革命”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年轻人怀着对权力的想象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活动中，女性试图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充分的权力。国家与国家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开始敞开。

当时，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学习，并成为先锋文学杂志——《原样》（*Tel Quel*）的一员。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研究了哲学和语言学理论。我着迷于无法避开的黑格尔思想，也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充满了激情。我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融入了我对法语、俄语、英语和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认识，也融合了我对一些重要理论的推崇和解读：俄罗斯后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涉及的符号学问题，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有关阐释的语言学理论，以及罗兰·巴爾特的符号学理论。而尤为重要的是，我发现了精神分析理论。那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梅兰妮·克莱因以及雅克·拉康所带来的精神分析学的突变对我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改造后的符号学，于我而言，是一种批判的科学，能够进行跨学科研究。它不仅面向社会和人类的历史敞开，而且也对科学敞开，如对精神生

活的研究可以延展到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驱力研究。

在这本书中，读者将能找到我建构的许多理论的起源。这些理论如互文性、符号态、象征态等，能够提供大量符号学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读者也能够发现 19 世纪末这一法国历史上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期的先锋文学随着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出现告别了诗歌的古典修辞方式。他们的诗歌中呈现出一种诗性语言的变革，这一变革为世纪末苟延残喘的社会带来了全新的韵律、被禁忌的欲望和惊世骇俗的理念。

诗歌总能带来自由，甚至在构成民族语言的社会契约的核心也是如此。在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文本中，这种自由以一种异常大胆，甚至闻所未闻的形式呈现。正是这种异端的独特性、固执的亲密感和反叛的存在最终在他们的文本中取得了话语权。

这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感谢中译本的译者，是你们将我“诗性语言”的概念带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感谢我的读者，谢谢你们在我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陪伴。

英译本序言

——里昂·S. 劳狄斯^①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理论批评界和知识分子界不容忽视的存在。她也是这一代法国主要理论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理论成果因挑战了长期以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传统而更显瞩目。美国学术界对她著作的译介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地迅速^②，但也已开始逐步认识到她的理论著作的重要性。我们旨在缩小这一差距，而随着对《诗性语言的革命》的翻译，克里斯蒂娃基本的理论著作已可供读者阅读。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目标是将诗性语言（这个概念很快会讨论）看成一种意指过程。也就是说，将诗性语言看成一个言说主体生成的符号系统，而这类言说主体处在社会和历史领域之中。书名中的“革命”指向的是在19世纪开始出现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持续的价值。这场革命影响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但是它也通过一种虽不尽相同却息息相关的方式影响着其他领域。事实上，哲学和历史已经发生改变，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也已经深入到理论研究之中，只有掌握了它们，我们才能认识到诗性语言的革命本质。克里斯蒂娃在这本书中集中讨论了大量的哲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文本（同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分析），用于支撑她的主要论点：19世纪后象征主义的先锋性在文学“再现”中引发了一场实在

^① 本篇序言的作者系里昂·S. 劳狄斯（Leon S. Roudiez, 1917—2004）。他自1959年起便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国文学，直至退休。劳狄斯生于纽约，在欧洲成长，属于具有欧陆学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主要致力于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作家和文学理论，曾翻译过多部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诗性语言的革命》的英译者为玛格丽特·沃勒（Margaret Waller）。

^② 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的革命》法文版出版于1974年。1978年，德译本正式出版。英译本出版于1984年，距离法文原版出版时间达十年之久。在此之前，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被译成英文版的有：《中国妇女》（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7），论文集《语言中的欲望》（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和《恐怖的权利》（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的突变。倘若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人们也可以在其他历史时期的关键著作中找到类似的对于革新的酝酿。

在本书提及的概念中，某些定义或者分类已经比较明晰。如“革命”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1970年，路易·阿尔都塞给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颇具挑战性但精准的界定，他认为：“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时代可能会有机会，被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戏剧性的、最耗时费力的严峻考验打上烙印，即发掘我们人类存在的最简单的事实——听说读写以及这些行为中的熟练度。”^①他再次强调，我们将这种“令人无所适从的知识”归功于少数几个人：马克思、尼采以及弗洛伊德。那么，诗性语言究竟该如何被界定呢？在这部克里斯蒂娃著作的语境中，诗性语言包含着“文学”与“诗歌”的概念，但是抽离了这些概念通常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此处的诗性语言并不指向所谓的“纯文学”或者韵律诗。诗性语言这一概念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是奥西普·布里克（Ossip Brik）的理论。1917年，他在莫斯科创办了诗性语言研究协会，这一协会的成员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布里克看来，诗性语言是与口头语言相对的，口头语言以交流为主要目的，而诗性语言则包含了布里克和其他语言学者关注的超理性语言。“任何试图将诗性功能领域限制在诗歌，或者将诗歌限制在诗性领域的努力，最终都会导致一种过分的、误导的简单化。”^②但是，无论是布里克还是雅柯布森，他们对诗性语言的界定都不足以说明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的概念。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一方面，她认同雅柯布森将诗性语言看成语言对常规的偏离；另一方面，她并没有将诗性语言看成语言符号的子码（sub-code），相反，她认为诗性语言代表着语言的无限可能性。所有其他的语言行为，仅仅是内在于诗性语言的所有可能性的部分实现。从这一观点来看，“文学实践，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与发现；一种将主体从一系列的语言学、精神和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活动；以及一种打破语言惯性的动态性，并授予语言学一种研究符号的意义生成的独特的可能性”^③。

我们应该清楚，克里斯蒂娃不能被称为形式主义者或者结构主义者。俄

① Louis Althusser, *Lire le Capital*, FM/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1970, pp. 1-12.

② Roman Jakobso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 de Minuit, 1963, p. 218.

③ Julia Kristeva, *Sé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Éd. du Seuil, 1969, pp. 178-179.

国形式主义者本身，事实上，在早期的、看似绝对的形式主义之后（形式主义这个称呼，最初是它们的敌对者所使用的带有轻蔑意义的术语），便开始向倾向于社会学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演变。而大多数的法国结构主义者，除卢西安·戈德曼之外，都倾向于将历史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皮亚杰（Jean Piaget）理念中的认知主体。正如在这本译著以及先前的克里斯蒂娃译著中所能看到的，克里斯蒂娃将文学和历史著作的历史维度考虑进来，同时分析了主体的角色。尽管这一主体在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异质的主体。

诗性语言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在此处并非因果，也非直接关联。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纽带所涉及的内容与萨特在阐释“介入”（engagement）这一概念时想要表述的逻辑截然不同。萨特将马拉美看作一个意识坚定的作者，然而这种坚定的意识大部分是通过拒绝他所生活的时代中“资产阶级的愚蠢”来呈现的。当萨特在审视马拉美的诗学实践时，他摒弃了所有提及“野兽般的本能或者性欲的黑暗历史”^①的部分。克里斯蒂娃强调了马拉美文本中的意指过程，并将其文本与马拉美一起看成现代先锋文本实践的雏形。克里斯蒂娃通过关注符号态格局的呈现，揭示出先锋诗人的书写实践与同时发生的无意识的逻辑和隐藏的驱力。尽管这种实践看似阴郁，但实际上它假定了语言交流的回归和享乐的特权。在后面的分析中，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在社会中对自由的肯定，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反抗（尽管它既没有公开提倡自由或者革命）。它所反抗的社会，是崇尚物质社会的商品和利润的。

诗性语言形成一种“符号系统”。符号态（le sémiotique）这个词，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我们对这个词的认识，需要将其放置在一种两极并存的状态之下。克里斯蒂娃界定了她的两个关键术语：符号态与象征态。这本译著的第一章细致地界定了这两个概念，在此总结一个需要一步一步论证的陈述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从少数几个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出发进行解释是必要的。克里斯蒂娃的关注重心是在符号学（la sémiotique）领域，符号学被认为是研究符号的整体科学。在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中，包含着一个特定的领域，她称为符号态。这一模态被看成是它的意指过程的两种模态之一，另一种是象征态（le symbolique）。这两种模态的区分，尽管并不能等同于无意识与意识，本我与超我，或者自然与社

① Jean-Paul Sartre, «L'Engagement de Mallarmé», *Obliques*, 1979, pp. 18-19, 169-194.

会的区分，但仍与这四组概念存在一种类推关系；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种模态。在这四组相对的概念中，存在着一种重复的辩证过程，其中一个概念来源于婴儿时期，同时卷入一种性别分化之中。这类辩证法一方面包含了驱力与冲动，另一方面则指向家庭与社会结构。与这一结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此处所设想的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对立存在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来运作。

因此，在克里斯蒂娃对诗性语言这个概念的详细阐述中，她格外重视拉康的思想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拉康理论的炙手可热，源于他进一步强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赋予语言的重要意义。1953年，拉康在罗马宣读了一篇引人关注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到：“（精神分析学的）资源是言说，在某种程度上，它赋予一个人的活动以意义。它的领域是具体的话语领域，作为一种主体的超个体的现实领域呈现出来。它的运作就是历史的运作，只有后者组成了现实内部真理的产生。”^① 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语言学的引入也十分明显。克里斯蒂娃运用了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理论，此外，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相较于二者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本维尼斯特去世后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中，克里斯蒂娃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其中她提到了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排除掉对任何不能系统化、结构化、逻辑化到某种正式的实体领域的探究。”尽管本维尼斯特卷入了同样的趋势中，“但是将语言这一对象向实践领域敞开，语言在实践中实现自身，超越语言，在语言的基础之上。语言作为一种整体的对象，要么相关的，要么呈现出问题”^②。克里斯蒂娃除了认为考虑主体和历史对于正确的文本分析是必需的，还同时提倡打破孤立相关的领域之间的壁垒。

事实上，文本分析相较于“文学分析”能更好地统括克里斯蒂娃所从事的研究。文本分析不仅将对美学和形式主体的考察转移到对文本背景的认识中去，同时也拒绝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似性，因为文学批评本身，是通过让作品面对预设立场或者是作品应当具备的理想概念来评价某部作品的；而文本分析的关键点，是考虑到进入著作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如何影响读者阅读，并对后者提供一种解释。被分析的文本，实际上是符号态和象征态格局

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Éd. du Seuil, 1966, p. 257.

② Julia Kristeva, Jean-Claude Milner et Nicolas Ruwet, eds.,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Éd. du Seuil, 1975, p. 230.

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此时，在脑海中熟记“文本”的词源学意义是有作用的。文本是一种质感，一种“类似线头、细沙之类的纤细之物互相交织所构成的格局或关联”（Webster, 2）。但是这种类推关系也止步于此，因为文本不能被看成一块已经完成的、不再变化的布料——它处在一种永恒的流动状态中，随着不同读者的干扰，知识的加深，以及历史的向前推进而改变。

因此，所谓“线索”的本质特征相互交织，也将决定诗性语言的存在或离场。这些跟随着驱力旋转的，以及在符号态的格局中所编织的内容，组成了克里斯蒂娃所谓的生成文本。这些内容都是在诗性语言中得以实现的。这些由于社会的、文化的、句法的以及语法的制约所产生的内容，形成了现象文本。它们的存在确保正常的交流活动。我们很少会碰到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只存在其中之一的情况。一个数学论证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现象文本；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作品，与未混杂的、纯粹的生成文本非常相近，苏珊·朗格曾这样描述：“在他的作品中，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感知的，也就是说，语言成了一种直接的物质存在。”^① 因为生成文本的存在总是通过语言的物理和物质层面显现出来的，如在不视词的意义的情形下将字母和声音进行组合。

早在1966—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一些论文中就分别详细阐述了这些理论概念。直到在《诗性语言的革命》这本书中，她才进行了更为系统和细致的论述。这与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以及其他理论家的著作大致上是同时期的。克里斯蒂娃吸收了这些理论家的理论精髓，正如伊芙琳·H. 泽普（Evelyn H. Zepp）所指出的，尤其具体到巴尔特以及艾柯的理论中，克里斯蒂娃“不仅处理了这些概念，而且已经从很多方面超越了他们”^②。这些理论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算是文学批评家。巴尔特可能是个例外，但也不能把他局限在文学批评这个分类中（克里斯蒂娃在巴黎七大所属的机构名为“文本与文档科学研究所”）。与其他理论家一样，克里斯蒂娃的关注点也是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所关注的内容；但是其他理论家们都毫无例外地尝试讨论“文学”研究之下的基本分支，而克里斯蒂娃的

① Susan Sontag,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Vintage, 1981, p. 25.

② Evelyn H. Zepp, «The Criticism of Julia Kristeva: A New Mode of Critical Thought», *Romanic Review*, January 1982, 73 (1): pp. 80–97.

特别之处却在于提供了一个构想的基础，从而改变了研究方法，无论人们在文学这个含混的标题下选择了怎样的具体方向。而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将提出一些建立在对克里斯蒂娃理论研究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

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需要，与我们不能为文学提供一个严谨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直接相关。俄国形式主义者尝试对文学进行界定，其他理论学派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最终都是徒劳的。在罗得费·扎德（Lotfi Zadeh）的术语^①中，“文学”书写的集合，类似于所谓“中年人”在社会的集合，这是一种模糊的集合，因其所依赖的事实数据具有不定性，而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至于这个事实数据，我们会考虑平均年龄以及对于动态类型的虚构。而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的制约，思想的文化先见以及美学模式就浮现于脑海。事实上，我们通常毫不犹豫地认同某个指定的人是中年人（我们不会考虑是称呼他/她年轻或者年老）。当我们在阅读一篇《党派评论》上的文章时，我们通常会本能地意识到它属于文学大类中的一个类型——短篇小说（我们绝不会将其误读为政治论文，尽管这一期刊发表了很多政治方面的文章）。我们同样知道，这些让我们得出结论的标准，在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地域，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在读者眼中，中世纪的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 1431—1463）在写《大遗言集》（*Grand Testament*）时早已年过中年，而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却英年早逝；但事实上，这两人都只活到三十来岁。贝朗热（Béranger）的作品在他在世时就被看作文学作品，但如今已没有多大价值。法国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例子却完全相反。关于这种模糊性，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的文学，是在历史中的某个既定时刻和既定社会环境中的文学。

正如克里斯蒂娃先前所陈述的，“文学”是我们的文化所消费的对象。它被看作一个成品，而它的生产过程却常常被忽视。^② 当我们将这一过程考虑进来时就可以意识到，作品的趣味性或者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被视为“文学”作品。对一个作品是否属于文学的判定既是伦理的，又是美学的，因此具有马克思主义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使得作品变得重要的，恰

^① Lotfi A. Zadeh, al. eds.,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Press, 1975.

^② 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 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Mouton, 1970, p. 50.

恰是文本的存在，即诗性语言。我在前文提到过数学的论证，从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数学的论证极其重要；而就我们个体以及群体“存在于世”的层面，诗性语言，具有更加本质的意义。

若我们考虑一部作品产生，就需要关注使这部作品得以存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是通过我们所谓的“书写主体”而不是“作者”来传输的。因为作者强调的是创作作品的人的意识目的，而创作具有凌驾于作品意义之上的权威性。书写主体的概念，驳斥了萨特的幻觉，即所谓无论读者在阅读中有多么深刻的体验，“作家一定比他们走得更远。无论读者如何在著作的不同部分找到关联……也都是因为这些关联是作者有意呈现的”^①。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的目的性，或者拒绝给有意识地书写著作的人一个角色，而是强调意识远远不能主宰书写的过程，书写主体是一个复杂的、意指的动力（参考本书1.5、1.10节、3.4节内容）。

那么，书写主体不仅包含了作者的意识，同时也包含了其无意识。而尤为重要，我们要拒绝重复几十年前的错误——被误导的批评家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研究作家的传记，然后尝试着运用他们从传记中所获得的知识来解释作品，从而对作家本人进行精神分析。事实上，这个出发点须是文本，整体的文本，而不应当是其他。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不要过分讨论）文本分析和弗洛伊德的梦叙述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是文本分析不止包含了一个层面，叙述梦境并不会必然地让叙述者成为诗人。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蒂娃对塞利纳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这为以上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论证。

书写主体同时也包括了非意识领域，这个领域并不受制于压抑，但也未到达意识领域。这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覆盖的领域：神话和偏见的整个系统呈现出我们在某个特定中心内部对社会和自身所处位置的观点。它包含了所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会去质疑的事物，因为我们假定它们是真实的，却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并非真理，而是服务于当权的组织、阶级和政党的精心构建。过程本身是复杂的，因为作家同样意识到自身处在历史的某一时刻，遵照历史的动力和趋势，并对其做出反应甚至是抵抗。克里斯蒂娃对书写过程的分析，具体表现在她对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分析中。他们的影响，同样可以在现代美国文本中找到，如福克纳的作品《押沙龙，押沙龙！》

^① Jean-Paul Sartre, *Situations II*, Gallimard, 1948, p. 103.

(*Absalom, Absalom!*)。这部小说是作家一切过往经历的结果,除了他所经历的个体的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还包括他的个体经历:一个住在密西西比的南方人,无论迎合还是抵抗都难逃历史的影响,他深知自身的南方家族史,见证了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困境,了解了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残酷的劳资关系,目睹了国会通过第一个社会改革的法案,注意到并可能赞成政府在有关黑人地位问题上的不作为。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在文本的线索中萌芽。^①

书写主体受到某个选择成为作家的人的推动,并用书写的形式表现出来。书写的决定包括创作随笔、诗歌、散文诗、日记或者小说。这种书写,运用罗兰·巴爾特的术语^②,可能是及物的或者不及物的。它可以是对某个仰慕的诗人或者小说家的模仿,也可能恰恰相反,是对已发表作品的驳斥。大致来说,正如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的革命》后半部分中所提出的:“文本假定了几种叙述的分类,要么是同时期的,要么是先前的。它们自己挪用了这些文本,用来认可或者是拒绝它们。但最终是占有它们……好像这些其他的叙述是一种鼓励,鼓舞文本本身来采取行动。”^③

这段论述举例说明了在文本分析过程中需要重复不断地考虑何种内容,从而来了解意指过程本身。一方面,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文本的语境——整体的语境来指称,这个语境包含着无意识、意识、前意识、语言学、文化、政治、文学;另一方面,又是文本独自引导我们走向整体语境的不同领域。毋庸置疑,研究文本的学者,虽然并非必须是一个精通所有领域的专家,但他仍需要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种缺憾:即这本书原著的部分内容并没有被完整地翻译出来。事实上,我们只将三分之一的内容译成了英文。《诗性语言的革命》全文是非常厚重的,总计646页,是克里斯蒂娃在1973年7月所提交的国家博士论文。这本博士论文的答辩,是一场盛况空前和激动人心的仪式,甚至有媒体应邀参与这场答辩。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派出记

① 对部分论点的初步考察,参看:Leon S. Roudiez, «Absalom, Absalom!: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radictions», *The Minnesota Review*, Fall 1981, NS17: 58-78.

② 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Richard Mackey and Eugenio Donato, eds.,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p. 134-145.

③ Julia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Éd. du Seuil, 1974, p. 338.